

探問「近代中國」 的幾種方式： 「全球史視野下 的近代中國」 學術研習營紀要

韓承樺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艾立德 (Alexander Kais)

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歷史系博士候選人

「唯有親臨歷史發生的真實場景，才能感受歷史的力量」，本次研習營的開幕式上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黃克武先生如是說道。究心於此意，2016年7月9日，由臺灣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、中國近代史學會，以及中國大陸華中師範大學三單位協力，將一眾師生聚集至可能是「創造」所謂「近代中國」之辛亥革命的發源地——武漢——於華師大舉辦了第二屆的「近代史學術研習營」。相較於前次研習營環繞著近代史研究的趨勢和議題，這次是將焦點轉向至「近代」時期，中國與之相迎往來的「世界」；希冀由開闢了「空間」、「地域」的視野，能從更多維的線索，發掘中國自近代以來歷經諸般劇烈變革的複雜歷史面貌。

以「全球」作為認識歷史場景的基調，是近年來歷史學研究趨勢中相當突出的一種取徑。其引致史家在觀察世界，開拓議題的視角，逐漸突破傳統以「民族」、「國家」等單一單位，觀察歷史的發展與變化；轉而審視幾種不同地域之間交涉的張力和情景。譬如描寫國家和國家、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交流、互動；又或者是討論單一區域、人群、思想智識、文化潮流，乃至於物質文化，如何藉由不同方式穿梭於世界各個角落的歷史故事。於是，觀省各種「歷史進程」(historical process) 在「全球」(universal) 和「地方」(local) 的拉扯與衝突之下，史家之方法、論題遂而改變，於

此催生了歷史研究的新興課題及成果。

擁有悠遠傳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，不應自外於這波趨勢。本屆的近代史學術研習營，即著眼於此。通過「全球史」的視角，過往近代史史家多所留意者諸如：制度變遷、政黨與政治、涉外關係與國際政治、軍事戰爭、知識思想、社會文化（宗教與社會）、性別文化幾個面向，研究者均試圖從其中探索不同程度、層次、對象間之交往互動的痕跡。為磨礫年輕一輩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青年學者，研習營內容自是觸及了此些論題。以下，本文將循此類目，分門別類地介紹本次研習營的內容。然此分類是由筆者擬定，概非依循研習營逐日的時程課表；且有幾個類別彼此之間更互有交織，無法斷然區別開來，本文筆錄之際自會稍作說明。這幾點還請讀者略加留意。

首先是關於制度變遷的議題。制度史的研究，一直都是傳統中國史範疇內相當重要的課題。各個斷代史的書寫，制度的部分皆是不可缺少的環節。本此研習營的開場首講，就是由華師大近代史研究所長朱英先生，向學員說明了研析「中國近代制度變遷」課題的可行方法及其要旨。環繞著此論題，朱英提及的八個面向，分別觸及了「空間、時間、變化」的問題。首先，與「中國」相關的「內、外緣環境」因素，中央、地方政府、政黨派系，和制度政策的實際執行者；以及制度條文本身與實際展演操作的影響層面。而切乎「近代」的時間性因

素，則提示我們需突破 1840 年此一界線的限制，重省傳統與現代二分法的限制。至於「變遷」的面向，朱氏主張擴大研究視野，以明清兩代為框架，鼓勵學員不受按年代序的研究取徑（chronological approach）之束縛，而注意不同領域間各個制度所發生的變化及彼此間的交會。譬如制度的變與未變、進步與倒退之發展、不同領域範疇間的制度，此三層面是研究者需並置同觀的。

「變遷」自是歷史研究最需關切的議題。傳統中國自近代以來的發展，政治情勢的變化，特別是以國、共兩黨之合作與競爭的複雜關係為基調，從中就開展出諸多研究課題。本次研習營有關「政黨與政治」的部分，就有四場相關主題的課程——劉維開、林桶法、李達嘉、虞和平。劉維開與林桶法的演講，是以「國民黨」為主題展開。深悉國民黨史的二位，分別針對國民黨的「訓政體制」，及其喪失中國之原因展開討論。兩場演講，皆替學員破除了過往對於這段現代史認識的迷思。劉維開提及，國民黨的「訓政體制」，研究者必須從一種「動態關係」的角度來認識這段時間的黨、政聯結和互動；而非是僵化且不變的。林桶法則認為，重思國民黨政治「失敗」的原因，應在破除成王敗寇、歷史必然論、本位觀念這三種迷思的基礎上展開。李達嘉及虞和平的講論，則是圍繞著「共產黨」、商人和政治文化三者。李達嘉以其新著為基礎，申述過往分析社會運動中時常忽略的商人角色，亦得重新

描寫「共產革命」的群眾基礎及聯合策略。虞和平的討論，焦點民族企業在 1949 年的政治選擇問題。虞氏的分析，仍是循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的解釋途徑，指出此些企業家之所以離開中國（部分是暫時性的），主要是出於為離棄國民黨統制的政治文化。

近代的政治發展及變化，除中國內部的「劇情主線」外，外部環境的影響亦不容忽視。於此，「涉外關係和國際政治」這對孿生兄弟，自無缺席於研習營。相關題旨的課程較多，共計有 7 場，觸及的時間段落則涵蓋自晚明至當代，涉及經濟、外交、思想文化幾種議題。林滿紅、李伯重、劉宏與張慧梅的三場演講，概為試圖以經濟史視野聯繫近代以來的中國與世界。特別是林滿紅與李伯重的講題，展現了試圖超越過往「中西對立」為主旨的史觀。林滿紅以海關資料為出發點，其中涉及的茶、糖、樟腦及作為經濟交易之貨幣——白銀——流通情況，很能具體說明清中葉以降的中國，如何與世界產生各式互動，並反身影響國內的政治、經濟、思想及社會文化的情勢。其外，林氏的演講，還特別提醒在場學子，可多加留意海關史料的豐富內容，其不僅提供關於經濟史的具體數據，亦涉及如音樂、鳥類、博物學等面向，應得從中開發許多題目。同樣關注全球史脈絡中的經濟議題，李伯重的討論則是企圖循此角度，重述中國史研究的老課題：晚明時期的歷史變化，可否視為中國「近代」的開端？李氏提出的答案，似為肯

定的。透過多方「經濟全球化」的證據，也強調經常為人忽略的歷史因素，像是南洋華僑，或者 16 世紀以來的「倭寇」及華商，顯示明代後期的中國，已逐漸進入「世界」交往互動的體系，並扮演積極角色。劉宏與張慧梅的討論，則將焦點轉至當代，從「一帶一路」的經濟合作模式，重省海外華商組織的角色。

涉及「外交關係」的討論，要以黃自進與李育民的演講為主。兩人分別代表兩種解釋中國對外關係的方式。黃自進以「近代中日關係研究」為題，一反民族主義式的角度，提出幾個探問中國、日本在政治軍事、外交衝突，以及政治人物來往互動過程中，所反映之歷史片段的議題及方法。相較之下，李育民採取較保守的態度，仍是從「不平等」的角度，書寫「條約制度」的歷史發展和可能的影響。其外，在這組主題下，李培德與潘光哲的題目，正好是環繞著「冷戰時期的知識分子與思想文化發展」，各自以其研究對象錢穆（1895-1990）與胡適（1891-1962）為出發點，析論東亞世界如何可能「主動」地在美國的冷戰策略中，採取接受或抵抗之姿態，從而在政治意識型態和學術思想間的緊張關係底下，發展己身所關懷的思想、文化論題。李氏以錢穆先生 5、60 年代在香港的活動為例，點明當時流行的亞洲主義與美援的關係。如其創辦之新亞書院，實是仰賴雅禮協會（Yale-in-China）的資源才得辦成。而錢穆日後選擇

前赴臺灣的原因，亦是出於冷戰時期意識型態與學術思想間之緊張關係的結果。而潘光哲是從文化史的角度，析論知識分子在冷戰時期如何構想己身的角色，特別還列舉當時中、西方的幾部著作，揭開知識分子對極權主義及國家體系的消極抵抗（latent resistance）。像是一輩子主張自由主義的胡適，其所以拒絕參與國民黨新創的孔孟學會，表面上以「忙碌」為理由，實際上則可代表胡適對該學會所宣傳的意識型態之不滿。李、潘的演說實提供克萊恩（Christina Klein）《冷戰東方主義》（*Cold War Orientalism*）一書的反面，說明該書中所描述的文化政策在東亞地區之世界裡的反應、接受、抵抗。（註1）

誠如「近代中國的歷史，就是一部戰爭的歷史」這句話，欲理解這段歷史的複雜面貌，「戰爭和軍事」定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課題。這個主題共有王奇生與張力的兩場演講。王奇生是以「抗戰史」為題展開，提出三個可深化研究的方向：初期的和、戰心態與論述，量化抗戰的歷史，中共軍隊體制的問題。在這三種方向底下，概尚有諸多子題，是聯繫著軍事戰爭本身，及其涉及之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文化等層面的變動。這就與張力的講題「戰爭與現代中國」密切相關。特別是在張力講論中提及的，從舊軍事史到新軍事史的變化；透過回顧、評析若干重要之相關論著，隨即凸顯了戰爭與近、現代中國歷史之方方面面，是互有相涉的。

知識和思想，亦為研究中國現代轉型時頗受注目的範疇。這部分概可區分為兩塊，一塊是談偏向政治或哲學層面的思想議題，另一塊則是近年來甚受關注的知識史研究。當然，兩塊是相互交涉的。王明珂以歷史與民族學的交會為出發點，討論中國近代史上西南族群自我認同的建構，及其在中央擴張之衝擊所發生的變化。王氏提出他對漢化的獨特見解，即是認為該族群不像詹姆斯·斯科特（James C. Scott）所謂，為了抵抗中央而逃至山間，而是以漢化進行一種消極的抵抗，即是部分標榜正統的身分，同時又藉由特定的歷史敘述強調其與中央的特殊關係，來確保其自主性。在近代中國國族主義浪潮之中，這兩種方式逐漸凝塑出屬於這些少數民族獨特、二元的自我歷史、文化認同，卻也在國家的支配及歸類的同時，促使少數民族逐漸失去對己身歷史的認同。許小青、何卓恩兩人的討論，是環繞著「大學、知識學科、政治文化」三個面向。許小青以北京大學為個案，說明逐漸出現於近代中國的大學院校和「政治變遷」、「知識制度體系轉型」、「社會重心重建」此三議題的聯繫。何卓恩則聚焦於單一知識學科——政治學系——析論其與公共政治意見的生產、傳播及影響。這牽涉到西方政治學知識於異地環境從專業化到本土化的緩進發展，亦為中國本土的政治、社會、思想文化脈絡的重整及新建。此一雙軌的變化過程，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。而章清的講題，則以「新型傳播

媒介」為主角，描述此類技術輸入中國後，如何重新塑造近代歷史的地景面貌。如「地方」在他人眼中的定義，與「士人」的活動範圍及網絡，即可因新興傳媒之功效，產生從「邊緣」上升至「中心」的效應。三個場次的討論，均揭橥了知識思想的研究，是與政治文化、機構、技術等外部因素密切相關的。

社會文化的部分，本次研習營是偏重「宗教與社會」的問題。這反映了近年來，「宗教」逐漸成為治近代史者不可忽視的切入視角。在中國轉向現代之際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「宗教」一直被認為是扮演著「傳統」與「迷信」的角色。漸漸地，研究者的視野方始改換，注意到「宗教」在中國邁向現代性的過程裡，亦得扮演著積極、能動的要角。於此，劉迅針對南陽地方社會的全真道教的細緻研究，最能揭示「道教」在這場追逐現代改革的競賽中，並非一個軟弱無助的參賽者。而是積極參與了現代化的進程。其能動性的體現，更是交織著宗教傳統和現代社會之需求。為確切釐清「宗教」之於近代中國的角色，付海晏的討論，展現其企圖以大量的資料庫資訊進行量化研究，得而更為精確且全面地掌握寺廟財產、人口信仰及空間分布的議題。劉家峰關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近代中國之「相遇」的講題，是以中國作為宗教交流的個案研究，試圖回應西方宗教研究關於宗教文化衝突，以及太過忽略中國的特殊性此二問題。透過劉氏的研

究，我們可以得出另一幅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交流的圖景，這是相異於 911 後世人熟習之宗教衝突的畫面，而是從屬於近代中國在地發展出的獨特性。王笛的主題，不同於三人緊扣「宗教」，而是以研究綜述的方式，向學員介紹西方學界關於中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論著。諸如「城市革命」、「婦女和家庭」、「社會轉型和城市化」等議題，皆為西方世界相當關注的問題。

與「宗教」同樣在近代史論述中淹沒其多姿身影者，要屬女性史研究。這自是囿於五四啟蒙論述所主導的近代史書寫傳統，致使關於婦女歷史的討論，始終無法擺脫「被害」、「被壓迫」的提問方式，從而忽視了女性於歷史長河裡的主體、能動性。而從環繞著「女性」的討論，隨著研究視野逐步拓展，治史者漸將焦點轉自「性別」——包括女性和男性的歷史——在男、女互動的歷史場景中，探索既是分屬又為交織在一起的兩性情緒、感受，以及身體、生活空間的片段。黃克武的演講，就是以自身學習、操作性別史／男性史研究的學思歷程，向學員講述了自己如何走入這片林地，何以選擇這幾個環繞著男性情慾、身體、性歡愉／想像的議題，這與自身對現世問題的關懷，是如何聯繫在一起。

將近一週的研習營課程，內容實甚豐富，收獲良多。但筆者亦得指出一兩點，作為日後續辦此類活動之參考。究其實，研習營中仍有部分講題，並無扣合營隊一開始訂

出的主題，向學員展示如何從「全球史」視野來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。甚至，研習營一直都未替「全球史」做清楚的定義；特別是，或許我們應藉此機會，省思從中國近代史研究角度可能看到的「全球史」的方向和特色。據此，主題與課程之間協調及配合的問題，還望主辦單位在籌備下屆研習營籌備時，能多所琢磨。除卻活動題旨之議，研習營的活動實是提供了兩國學生、老師間良好且密切的交流機會。這具體展現於學員彼此間，乃至於其和老師之間的發問、討論、甚至是辯論。不僅在兩場關於政治史、經濟社會史的學術沙龍上，師生可較自由地交換學術意見、心得；每天的茶敘或宴席間，老師們甚是樂於融入學生群體中聊天，以及最後一日的研究計畫發表會上，與會學者皆十分大方地給予學員寶貴的意見。這或許即為參與本次活動者，最為珍貴的經驗。藉由此會，關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年輕研究者，更是得以建立日後交流互動的基礎，持續在近代史研究這片沃土，疊澆新意。

【註釋】

1. Christina Klein, *Cold War Orientalism: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, 1945-1961* (Berkeley; 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3).

徵稿啟事



國史館館刊

本刊收入 2016 年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 THCI 核心期刊

本刊為一專業學術性季刊，凡與中華民國史、臺灣史等相關議題之未出版研究論文及書評，均歡迎投稿。

來稿請寄：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「國史館館刊編輯委員會」收，或寄電子郵件至：bah@drnh.gov.tw。

各期電子全文暨稿約詳見國史館網站：www.drnh.gov.tw。

訂購詳見「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」（頁 244）